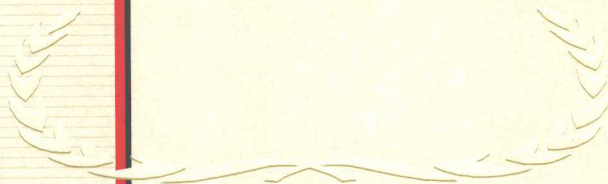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

回向传统

儒学的哲思



DANGDAI
ZHONGGUO
ZHEXUEJIA
WENK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



陈来卷

回 向 传 统
儒 学 的 哲 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向传统—儒学的哲思/陈来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5

(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

ISBN 978-7-303-12104-5

I. ①回… II. ①陈… III. ①儒家—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7223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55 mm × 235 mm
印张: 29
字数: 42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策划编辑: 饶 涛 责任编辑: 祁传华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鹳 责任印制: 李 鹳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著名哲学家陈来先生访谈录

(代序)

问：陈先生，您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研究领域里的领军人物，非常高兴能邀请到您做学术访谈。实际上“中国哲学”是20世纪才有的概念，请谈谈您自己的理解。

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了中国人一百多年。中国历史上有“哲人”和“哲”，但没有“哲学”这个词，现在汉语里的“哲学”是日本人翻译西文 philosophy 一词时，用中国的汉字所构造的一个词。有些词是中国历史上有过的，比如说“科学”、“宗教”，当然这些词并不是现代“科学”、“宗教”的意义。而“哲学”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就没出现过。

一般说哲学，都是指从西方，主要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在欧洲历史上有它自己的问题，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历史。这样的“哲学”在历史上发展成为西方知识门类的一种。

哲学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哲学并不是科学的一种。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受民族性和地区文化的影响不是那么大，普遍性比较强。可是哲学作

为文化的一部分，一定和民族语言、地方性都有一些连带关系，但近代以来，因为西方是一个强势文化，所以全世界后发展的各个地区都是以西方为楷模。所谓以西方为楷模就是全面地学习西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文化和教育上学习西方，比如学习西方建立大学，建立大学制度就要移植西方大学对近代知识体系的门类划分。西方的这些划分有些是有普遍性的，比如说物理、化学这些自然科学的门类。当然自然科学也在不断发展，这些科学的门类也在不断分化。另外，从人文社会方面来说，特别是人文学，这些门类不是科学，它带有西方的一些特点，比如哲学就是，因为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独立地发展，中国可以说有哲学思想，但它没有形成独立的一门学问，西方是独立地把哲学作为知识的一个门类，这样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近代学习西方，就把西方根据它自己的历史文化经验所发展所沿袭下来的那一些学科的划分，作为近代化的一些标准移植过来了。移植过来当然就遇到一些问题。自然科学没有这个问题，文学、历史问题很小，但哲学一开始就涉及这个问题。把哲学移植到中国，我们可以学习西方那些叫哲学的东西，但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有没有这个哲学。如果说建立历史系，除了讲西方的历史以外，还可以讲中国历史，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学，中国有小说、诗歌、诗歌理论等，但是哲学，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哲学？（康香阁：有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套理论体系，它这一套理论的体系虽然是研究宇宙、社会、人生，但它有一些特别的西方的问题。比如说它是受制于西方的语言，像西方哲学研究的“是”的问题，在中国哲学里没有这样的问题。可是“是”的问题就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基本特征。你要拿这个“是”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话，中国就没有这样讨论。另外西方许多其他各种各样的讨论，像古希腊哲学里对“相”的讨论，因为“相”那个东西讲的是个共相，比方圆是一些不太圆的东西的一个抽象的共相，但对古希腊人来讲“圆”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叫“相”。西方哲学有它自己的一套专有的概念、问题、体系。如果要这样看，在中国哲学中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有的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有些人认为中国有哲学，只是我们没有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人的那种讨论方式，比如说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古代也讨论共相的

问题，也讨论存在的问题，只是说中国的哲学它不是自然成为体系，它分散在思想的各个结构里。所以我们要把它抓出来捏在一块，这就是中国哲学。

问：您是否同意近年来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这一命题？请谈谈您的理解。

答：这个命题实际是说“中国哲学”这个说法到底成立不成立，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你叫中国哲学就成笑话了。法国的哲学家德里达近年说中国没有哲学，引来了大家重新讨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提法我不是很赞成，我认为这个提法应反过来，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经过19世纪、20世纪整个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问题应该怎么提呢，应该是“西方式的对哲学理解的合法性”问题。我们以前很多人，包括西方人，都是以西方式的那种对哲学的理解方式来认识哲学。什么叫哲学，你必须讨论西方的问题，以西方人的那种方式去讨论，这才叫哲学，这就是西方式的对哲学的理解。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理解到今天如果还是如此的话，它有没有合法性？我的想法是说，在哲学观上要把哲学看成文化，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共相，哲学不能仅仅是西方意识及其文化经验所规定的那种东西。应该以全部的人类文化的视野来看待哲学。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维特根斯坦的讲法，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为什么？西方人有西方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中国人有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印度人有印度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日本人有日本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所以一切关系宇宙、人生、人心、实践的各个地方的那种理论性的思考就是哲学。这种思考在中国叫义理之学，我们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义理之学就是对宇宙、人生、人心、道德实践在理论上的探究，世界各地具体讨论的问题不一样。比如中国人讨论“道”的问题，西方人不讨论；印度人讨论“梵”，西方人也不讨论；中西印哲学有它各自的问题。因为哲学是文化，文化是很特殊的，以前我们受一些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认为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样：精神和物质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哲学的具体讨论和问题意识来说，在直接意义上不一定是这样。在直接意义上，西方人和中国人讨论的就是不一样的。在抽象意义上说，都是对

宇宙的一种研究，都是对人生的一种研究。但具体来看，比如中国人讲“天人关系”，讲“道”讲“理”的问题，这些西方人不讨论；西方人讨论“是”的问题、“在”的问题，讨论“相”的问题，这个中国人也不讨论；像印度、日本都有它们的独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人生的那种理论思考，那就是哲学。所以我觉得在历史上西方哲学所讨论的话题和所讨论的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它也是哲学的一个特例。中国哲学也是一个特例，比如说苹果它是一个共相，有烟台苹果，有大连苹果，有河北苹果，这是个体特点，不能说烟台的苹果就是苹果，是标准苹果，别的地方的苹果不标准，不能这样讲。就像今天我们理解全人类的文化，不能仅仅站在西方文化这一点，把西方文化完全作为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中国就有哲学，只是中国哲学不是都讨论西方的那些东西，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所以我们想哲学这个词（概念）它不应该仅仅是西方传统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应该是在世界多元文化里边有包容性的一个普遍概念，在这点上西方人到现在没有变过来。西方人认为他们历史发展的那个形态才叫哲学，我们认为不是。所以我想，现在我们非西方哲学家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发展这种广义的哲学概念。西方式的理解是一种狭义的哲学，它是以一种西方的经验，看西方人讨论什么问题来界定哲学。我们要发展广义的哲学概念，所以要在世界范围内破除那种在哲学概念上理解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这样做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间的文化对话，这样来发展 21 世纪整个人类的智慧。如果说我们把哲学还是仅仅了解为西方那种传统的哲学，甚至像美国一样更窄，是英美的一种分析哲学，那就赶不上时代的发展。在这一点，我强调“哲学”必须是立于人类全部文化的一个概念，凡是各个民族它对宇宙、社会、人生，对自然，对超越，都有它的一个系统的理论思考，这就是哲学。我们中国思想历史上以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就是中国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法是有问题的，还是把西方作为一个标准说我们中国哲学合法不合法。我们要反过来问，在今天这个马克思叫做走向世界史的时代，从现代化来讲叫全球化的时代，从后现代来说是多元文化论的时代，那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意识还要统治哲学领域多久？我们必须立足于全部的人类文化发展出一个包容性更大

的一个哲学观念，我觉得这样才有意义。

问：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内涵与范围，您曾提出“培养”和“研究”的两面结构，请再谈谈您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

答：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哲人”对自然界、对超越、对人生、对社会、对我们人心、对我们的实践的一些理论的思考。中国哲学这个词，有不同的概念，现在我谈的两面性这个结构，主要讲作为学科的这个“中国哲学”。刚才我讲的作为人类智慧的一个部分，中国有中国哲学，如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老子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部分，这些是就中国哲学它本来的思想体系而言的。

但是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科概念有西方哲学，有中国哲学，有科学哲学，有伦理学，学科都分化了。作为学科概念的中国哲学，是指对孔子的研究、对老子的研究。作为中国哲学智慧的体系，孔子思想、老子思想都是中国哲学。但是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是指对孔子的研究、对老子的研究，对众多中国古代历史上哲学思想家的研究，学科的概念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哲学学科它是近代教育体制里的一个领域，科研体制里的一个领域，比如现在有很多学科点：有博士点、硕士点，这些点所开展的工作就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基本内涵。我讲的培养和研究的问题意义何在？在于掌握我们学科发展、学科建设关系的一个区分。我们现在讲的中国哲学学科，就教育的层面来看，我们现在本科教学里边设有中国哲学的课程，有硕士点的开硕士生中国哲学的课程，有博士点也开设这个课程培养博士生。从这些方面来讲，主要工作是培养人，在这样一个“培养”的方向上的工作的性质跟“研究”的性质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当然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条件有关系的。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各个学科点，都是从以前的大学里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演变过来的，以前都叫中国哲学史，现在是叫中国哲学了，但是实际作为培养的内容没有变。我是强调，虽然我们是叫中国哲学，但就培养人来讲，我们就是教中国哲学史的，我们开的课程就是讲中国哲学史的课程，所以中国哲学学科的内容它主要是以中国哲学史为专业的这种教学和培养，在这个中国哲学学科里边我们给本科生和研究生所提供的就是中国哲学史的

这种训练，特别是注重对古典文本的一种解读和分析，这是我们始终强调的。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中国哲学的教学不是教学生如何当哲学家。就好像我们中文系教学生，我们的目的不是教他当作家，而是教他许多文学的知识。中国哲学也是这样，不是把每一学生都培养成为哲学家，而主要是提供哲学史的训练，使这些人能够具有独立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能力，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学科的自我理解。与这个培养相对的，就是研究，我刚才讲的主要是教学，教学主要是培养，培养主要是讲中国哲学史。但这个学科它有另一部分，就是研究。研究主要就是大学的老师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这些研究的一大部分也是作中国哲学史研究，但也有一部分学者他从对中国哲学史的熟悉研究为基础慢慢就发展成为他自己提出一套哲学思想。这种自己进入到一种哲学发展研究也叫中国哲学，比如说冯友兰先生，最早他是作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到了抗战期间他写的《新理学》等六本书，《新理学》就是讲他自己的一套哲学。但是他不是跟中国哲学没关系，为什么叫《新理学》呢？他以传统的理学作为一个根基来加以翻新，它是新理学，它不是纯粹西方的东西，纯西方的话那就不能叫中国哲学了。所以中国哲学，就研究的那一面说，它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哲学史，还有一种从中国哲学出发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发展的一种哲学研究，这是培养与研究最大的不同。明确这个不同，我们就可以知道，做哲学家是在研究里边一小部分人做的事情。但是培养，我们作为中国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一定要明确，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功，我自己对国内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最重视。我之所以强调它，是因为国内有些学科点在这个方面的意识不是很强，比如说学生写一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是讲他自己一套哲学，这是不行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边是不行的，在西方也是一样。另外你也没有这个条件，做哲学家还是要有一定条件的，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学科和培养的目标一定要明确，还要以中国哲学史作为它的内容和特点，否则的话你做出的东西离开了哲学史，就变成了一种没有根的，一种自说自话的东西，这是我们现在不赞成的。另外从全国中国哲学学会来讲，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也是这样的，就是要促进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几千年的中国哲学体系本身非常之大，这个体系近代以来它要进入一个学术研究的状态。

以前大家都是自己讲自己的，即使是叙述或研究别人的东西也是采取非常简单的方法，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是这样的。现在的学术研究不是，所谓近代大学的学术研究就要把古典的东西放在现代学术语言环境里，用现代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任务非常沉重，我们过去一个世纪根本就没做完这件事情。所以在现在这个学科体制里边有中国哲学史这一科，这一学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很好地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这是我强调的。

问：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您作为北大学派的中坚代表，很强调“内在性”和“主体性”，请介绍一下您对怎样研究中国哲学的看法。

答：这个问题和前边的问题也有些关系。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其实还不到一百年，因为古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本来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学科是对孔子、老子的研究，对朱熹的研究，对王阳明的研究，这个历史的研究还不到一百年。这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总体来讲，它的任务是整理和重述的工作，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之所以称其为基础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现代这种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属于近代学术研究。古代也有一些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分析，那个不是近代的学术。我们对古代哲学思想的一种系统客观的整理，那是近代学术的一个新任务。古代没有，古代都是简单的分类，这个是江西的学者，那个是福建的学者，按地域分分派就完了。现在这种系统客观的对古代思想的整理是近代大学教育里才有的，这是个新任务，任务很重，需要许多年做一个系统客观的整理。第二个原因是说，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的语言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是白话语文的转变，所以我们的一些整理也好，重述也好，都是从现代白话的语文来整理来重述。我们现在讲中国古代哲学，你不能说用古话来讲，如《中庸》讲：“天命之谓性”是什么意思？你要用现在的白话把它分析清楚，这个语言的变化是个根本性的转变，怎么把这种古典的语言用现代的白话语言进行整理和重述，这是第二个重要困难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现在重述的现代白话的语文，使用的概念是在一个世纪发展中跟西方哲学有转移关系的这套语言。我们现在用的哲学概念不是在本土造的，大部分是从

西方翻译介绍过来的这种哲学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在重述和整理的时候不仅是要用现代白话语言，而且是要用现代哲学的语言。现代的哲学语言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这些东西在这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已经成了我们现在中国哲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不能不用。为什么我说这个工作这么重要、这么困难呢？一个是历史，那么长久、二千多年的一个大体系，你把它作为一个近代学术的研究，这个学术的转型有很大的困难，然后整个用白话语言重新来说明整理，这有很大困难，你要用西方转移过来的现代哲学语言也是比较难的。最重要的困难还在于整理和重述过程里边要有一个内在的理解为基础。西方哲学有“存在”、“是”、“相”、“理念”等概念，你就用西方的这些哲学基本问题去套中国哲学问题，那是不行的。中国老一辈的哲学家就有这样的说法，认为西方哲学的问题就是中国哲学问题，所以就武断地把中国哲学史的讨论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去套，其实不是。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对西方哲学理解的偏差，造成了理解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为“内在的理解”，是强调世界各个文化里边每一种哲学都有它自己的一套体系，你一定要到它内在的体系里去了解、去摸索。内在地去掌握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它的固有的问题、本有的体系是什么。世界各个哲学系统的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有些老学者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世界的哲学的问题都一样，都是精神和物质的问题，都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其实不是，现在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哲学它直接讨论的哲学范畴所构成的那些哲学问题，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要强调要在“内在的理解”中来了解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它自己的那个体系构造是什么，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把中国哲学当成了论证欧洲哲学的例子。以前我们很多的老先生就这样说：研究中国哲学是干什么呢？就只是论证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不对的。张（岱年）先生他始终强调，我们要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精神。心知其意是一种还原的精神。你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人讲的是是什么，不是表面地一看，随意地去比附它。你要内在了解这个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揭示出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中国哲学有的问题是西方没有的，这些问题像“道”、“理”等都是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我强调内在性就是这个意义。另外，这样的研究当然也就是强调作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性。我们不要不

经过研究就把西方的问题当做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善于发现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所谓主体性丧失就是说总把别人的问题当做哲学问题，把西方哲学问题当做哲学问题，其实是忽略了我们固有的那些哲学问题作为哲学问题的意义，如说“道”是个哲学问题，一定要把“道”说成一个“思维”才是哲学问题，只有把道说成“精神”才是哲学问题，这就是主体性的丧失。所以内在的研究它是强调中国哲学主体性的一个方面。我觉得以前包括冯先生、张先生在早期这方面强调都不够，好像觉得东西方哲学问题差不多。因为冯先生、张先生那个时候时代不同，西方的文化力量比较强，多元文化主义、多元化的世界格局没有出现，而且中国民族文化自信心不强。我想我们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应该理直气壮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应该强调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不能把中国哲学只当做欧洲哲学的一些达不到标准的例子。

冯先生当时也这样讲，问题是一样的，西方人讲得清楚，中国人没有讲清楚。这样还是完全以西方人的意识为标准。我们没讨论他那个问题，自然就不符合他的那个标准了，比如说他对“存在”、对“相”的问题的强调，我们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看自己的问题，不是跟着他的问题走，而是跟着我们自己的问题走，按自己的方式，那我们自己就说得很清楚了。我想从治学的方法来说，内在性、主体性是跟客观性联系在一起的，但只有内在地了解并保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才能把中国哲学的特点、面貌、格局及其体系客观地呈现出来，否则就不能做到客观的呈现。

问：关于中国哲学研究如何走向世界，作为经常到境外讲学和与国际学界频繁交往的学者，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世界性的眼光，世界性眼光首先是学科边界。我们国内的学科点，中国哲学学科的这些从业人员，你怎样理解这个学科的边界，你这个边界划在那儿，就决定了你自己的研究所必须要涉猎和参考的那些文献的范围，比如我们有些学者只看自己学校老师的著作、论文，别人的都不看，那就比较狭隘了；还有些学者只看我这个地方，比如我在北京，我在上海，只看这些地方学者的研究，也不行；更好一点儿的是全国都看，但这也还不行。如果你仅仅把你的学科的边界划在国内，你就只能了解在中国大陆这一块，那你是不能走向世界的。所以我说的这个世界眼光，就是要把这个边界划到全世界。这

和科学一样，不能说你参考的文献只是中国科学院学者的文献，外国的都不看。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你要把你的学科边界划在什么地方，你就会去留心什么地方的研究。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对中国之外的研究完全不了解，也没有想去了解的意愿，当然在客观条件方面是有些差别，比如我们想了解日本，了解美国的一些文献不一定能找得到，有一定困难，但不是不能解决。比如，你在河北可以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资料，信息比较全也比较广。在江苏你可以到上海去查，条件总会有，你就是在云南也可以到北京去查。关键是我们的学科意识要走向世界，现在我们有些人不仅国内信息不了解，就是中文世界如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华文世界的出版物也不了解，就认为我最好，自说自话，孤芳自赏，其实是坐井观天。必须要跳出这个井口的心态，了解世界上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

第二是眼光有了，该怎么做的问题。这个“做”要有一个评价的标准，你的评价标准必须是世界性的，不能仅仅以一个学校的水平作为评价的标准，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来了解这个评价的体系，到底什么是高水平的研究，什么是低水平的研究，要放在整个的世界学术体系来看。这样的话你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取法乎上。如果不在一个世界性学术社群上来取得这个标准，只是把自己限于一个很狭隘的地方，这个学术境界不会很高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接轨问题，而是眼光的问题，没有世界眼光，别人研究什么都不知道、人家怎么评价好坏也不知道，只认为自己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这是很可怕的。而且不了解世界，会导致你的学术根本没法进行交流，人家当然也没办法对你的成果进行评价，这样情况在我们学界是比较多的。我并不是说外国的都好，各地方都有自己的所长，比如说日本的研究，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领先我们很多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整个世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由日本来主导的，因为它起步早，人员也多，配备也很得力，所有中国哲学的专人、专书、专题它都有很好的很扎实的实证研究，我们对人家的研究都不了解都不看，那你写的东西人家一看就觉得没有价值，因为你不仅没有参考人家，没有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你根本没有达到人家已经达到的成就和水平。英美在学术的实证研究上不一定比日本强，但英美善于提出一些大的分析范式，有些东西在学术界已形成一种很有

影响的东西，特别是欧美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它会运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重要理论来处理中国问题。如果对此都不了解，那你的整个学术眼界，看问题的视角就跟人家差多了，你也就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里边得到同行的积极评价，我想这两个是最基本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理想境界。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而且期望中国哲学研究应该由中国人来主导，我们应该走在世界的前头，我们要负起中国哲学这个学科领导的责任，我们要有这种心胸，要能够应对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现的各种挑战，这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日本、美国现在都有一些新的研究对我们很有挑战性，我现在做的工作其实很多方面都是要回答这些挑战。现代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围的挑战我自己了解稍微多一些，另外我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做这些工作。我多年来做的不少工作都是回应中国思想史的挑战，因为现在日本和美国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占多数，不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占主流，当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是相通的，但是有差别，现在日本和美国流行的都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有它的特点，它从特定角度对我们中国哲学研究提出一个挑战，我们要回应这个挑战，以掌握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权，我们才能走向更高的境界。

问：20 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先生是奠基者，您与两位大师关系密切，请谈谈您对两位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看法。

答：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是我们北大学派代表性的前辈，他们的哲学方法有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就是都很强调理论的分析。如果用 20 世纪的哲学语言说就是很重视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把逻辑分析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是冯先生和张先生的共同特点，这个特点是来自老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特点。老清华哲学系和老北大哲学系不一样的是，清华强调哲学的逻辑分析，这是受罗素等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的影响，所以冯先生和张先生等作为清华学派的这些成员，他们的中国哲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是贯彻逻辑分析的方法，因为逻辑分析的方法能把那些概念分析得非常清楚，你看冯先生说“天”有几种含义，张先生对“理”等都分析得非常细致，这就是用逻辑分析的方

法。冯先生的特点除了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之外，对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境界他有一种体会，他的研究是跟这个体会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他就比较能够掌握到中国哲学的一些精神、神髓，能够达到比较高的境界。他不是完全西化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心灵上的沟通理解，到底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境界，他有一种内在的理解。这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个西方的知识型的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我觉得这是冯先生很难得的一点。

张先生在哲学史方面所做的工作其实比冯先生更多。张先生除了逻辑分析之外，最重要的是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叫八字真经。我跟张先生做学生所学来的方法就是这八个字，就是对古代文本要细致地研究，要了解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不能随便看看就望文生义，随便地比附，不行。一定要有一种深入地还原的精神，因为我们近代以来研究中国哲学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乱用西方的术语，不顾中国哲学问题讨论的本来意思。西方很多术语当然有助于我们分析，如本质、现象等，但在中国哲学的语言叙述里边，哪些可以用这些语言叙述，哪些是不可以的，要做很细致的文本解读。张先生强调一种对文献深度的解读和一种还原的精神。冯先生不是特别强调这些，但在实践上也是贯穿着这种精神的。我作为张先生的学生，认为张先生这一方法论的示范意义非常重要。大家现在都不太强调张先生的这一点，很多人都讲张先生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这个意义要在另一个地方讨论。我觉得就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讲，最重要的是张先生的治学方法。我自认为跟张先生学到了一些治学方法。如果说我的研究有些成就的话，那就是比较好地运用了张先生提倡的这些方法。张先生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对文献的一种深入细致的解读，掌握它原来的意思，这是张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特点。另一方面，你掌握了以后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把它一层一层讲出来，不能囫圇吞枣，说得糊里糊涂人家都不明白，用逻辑分析很清晰的方法，这在中国古代叫做“辨名析理”。朱（朱伯崑）先生也是继承了老清华（大学）的传统。我们现在虽然是北大学派，北大学派实际上是融合、发展了老清华的传统，就是很注重辨名析理，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是老清华传统，也有北大的一些传统，比如我自己，我们也很注意对资料的考察和考证，对文献资料的全面把握和考证也很重要（康香阁：您

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做的非常深入，应该说已经超过了日本等外国学者）。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工作呢？这个工作跟你的眼界有关系，你的眼界盯着谁呢？你的眼界盯着日本学术界，你要比他做得更好，你才能做这样的工作。你眼睛只看着一个很小的圈子，你怎么去工作？世界上谁做得最好，我们就盯着谁，这样你的成果才能达到较高的水平（康香阁：您每出版一部著作，外界的评论都是精品，我想这是您把北大传统和清华传统结合起来的成果）。

20 世纪冯先生、张先生是奠基性的大师，为什么说奠基呢？因为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主要还是通史的研究，主体上是通史研究。“三史”论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冯先生讲的。“三史”就是指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是通史性质的著作。张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也是一部中国哲学史，是以问题为纲的一种中国哲学通史，这是老先生们在奠基的时代给我们打下的好基础。可是学科的发展不能年年写通史，只有做教材才需要再写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是指从通史的时代进步到专题研究的时代。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已经深入了，已经告别了通史的时代。当然为了教学的需要还可以写通史，但是学者真正需要去做的是这些专题性研究，要做这些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今天和张先生、冯先生已经是在一个不同的阶段了，或者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已不是张先生、冯先生时代所要做了。比如说我自己做了很多专门的研究，像宋元明清大的哲学家我都研究过，比如朱熹的专门研究，王阳明的专门研究，王船山的专门研究。这以前都不是冯先生、张先生专门做的，他们那个时代不强调专门研究，但到了我们这一代要进行专门研究。随着学科的深化，不仅中国这样，全世界也这样，或者说世界上早就是这样。我们已经进入了与冯先生、张先生不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怎样继承和发扬张先生、冯先生的哲学方法？我想，虽然处理的主题不一样，但处理的基本方法还是一样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逻辑分析还是一样的。我是张先生的学生，我又是冯先生的助手。我今天的工作更希望把冯先生、张先生治学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不是仅仅吸收冯先生，也不是仅仅吸收张先生，而是把老先生好的东西都吸收过来，运用到我自己的专题研究中去，做出最好的成绩，这是我对张先生、冯先生治学方法的态度。

问：您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权威，对宋元明清时代的三大哲学家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都有突破性的研究，请谈谈您的看法。

答：我的第一条经验是要站得高，看得远，这是很重要的。我对这些任务和问题研究从来是在世界性的一个学科里边来找它的标准，给自己定任务。比如说对朱熹的研究，我做的时候注意了解世界上特别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你如果不了解别人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就很难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的特点是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注意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在世界上的这种发展，不仅仅看中国人写的东西，还要了解这个学科在国际上已经达到的标准，知道人家做到什么程度，知道人家做什么，没做什么，然后做自己的，这是第一条经验。

第二条是要扎实，从基础性工作做起，在最基本的工作上下功夫。我做的研究都是从一些最基本性工作做起。做朱熹的研究我是从资料的考证开始的，别人以前都没做过的资料考证我来做。比如说我对朱熹的两千多封书信都考证了它的时间、年代。不考证这些时间年代你怎么用这些材料？你要用这些材料就要下工夫，下工夫以后你就会知道，自己的水平已经比别人高了，别人没做过这个研究，没有这样深入地去材料的工作，这就保证了你比别人做得更好。对王阳明的研究也是从很小的地方做起，从他的讲学地阳明洞这个地方进行考证，从很多地方志材料入手来做深入研究，这些都是以前人讲错的或者没做的这些工作，所以我的工作特点比较多地是从材料入手，从材料的考证入手。但是材料考证是基础，不是以材料的考证为满足，考证是为了使你有了雄厚的材料基础，保证你以后开展哲学分析有基础，哲学的研究分析才是落脚点，即用张先生、冯先生的方法进行辨名析理的分析。另外就是比较留心西方哲学的发展，我写王阳明的时候，当时所能看到的19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的书我都看了，但我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是为我所用，而不是跟着它走，看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把中国的问题阐发得更清楚，如果是我就用。如果不用西方的东西可以讲清楚，我就不用。西方哲学一个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哲学问题意识和特点的参照系；同时它可能成为一种工具帮助我把中国哲学的问题阐述得更清楚，如果不是这两个目的我不会盲目跟着西方哲学走，这是我研究的一个特点。此外，我对研究什么问题，在掌握上可能有一定特点，我比较注意的是一些别人